

●黄政明

略论毛泽东财税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写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稿，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和财政经济思想。本文试就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1957年期间的财政税收思想作一论述，一则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二则为人们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提供借鉴。

一、经济决定财政税收的思想

在如何认识和处理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决定财政税收这一根本思想，科学地解决了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一思想，包含以下一些内容：

1.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财经工作的总方针

1933年8月，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财经工作总方针这一基本思想的萌芽。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说：“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¹⁾。1934年，毛泽东则提出了这一基本思想的雏型。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²⁾。1942年，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明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³⁾。同时，毛泽东还把这一总方针归结为一种规律，一个为抗战的历史事实所证实的真理。他说：“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⁴⁾。此后，毛泽东在指导财经工作时，一贯坚持了这一总方针。如1945年底，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仍然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⁵⁾。再如1947年，他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谈到如何解决生产和财政问题时强调：“这里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⁶⁾。

2. 决定财政税收的是经济

1933年，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决定财政税收的思想萌芽。他说：“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⁷⁾。1942年底，毛泽东明确而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经济决定财政税收的思想。他首先批判了某些人的单纯、片面的财政思想，说：“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⁸⁾。并指出：“这

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⁹⁾。然后，他明确地指出：

“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¹⁰⁾。他还进一步阐述道：“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¹¹⁾。1947年，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经济决定财政税收这一基本思想。他说：“各地必须作长期打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生产和节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因此，必须反对片面地着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¹²⁾。

3. 必须培养财源税源

毛泽东按照他的“经济决定财政”的思想逻辑，必然要强调培养财源税源的重要性。毛泽东所指的财源税源，主要是指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及对外贸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对苏区、解放区以外的贸易）。毛泽东多次批评忽视培养财源税源的错误思想与作法，如他在1942年说“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¹³⁾。

4. 正确处理货币发行与经济、财政需要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体现价值关系的。因此，货币的发行不是随意的，而一定要体现经济发展的需要。那种离开经济发展状况，单纯为着财政的需要去随意发行货币的思想与作法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关系，毛泽东早在1934年就有清楚而正确的认识。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明确指出：“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¹⁴⁾。从而正确地把握了货币发行与经济需要、财政需要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税收思想

毛泽东没有专门的文章论述税收问题，主要在关于战争问题、财政问题和经济建设等论述中谈到税收问题。但只要仔细分析、研究与归纳，仍可发现其较为丰富的税收思想观点。

1. 税收的存在是必要的

对于税收存在的必要性，毛泽东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的。

一是从军队给养和党、政机关活动经费供给的需要去说明税收是必要的。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谈到土地税时说：“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¹⁵⁾。1942年，毛泽东认为税收是财政的一部分，是抗日经费供给的一部分，是必要的。他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百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百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¹⁶⁾。“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¹⁷⁾。为了进一步说明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是必要的，毛泽东还批判了单纯施“仁政”的错误观点。他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该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不胜利，所谓‘仁’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¹⁸⁾。

二是从积累建设资金的需要去说明税收是必要的。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谈到了农业税是积累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¹⁸⁾。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三兼顾原则时指出:作为国家利益的国家税收要适当⁽²⁰⁾。在那时,当国家税收转化为财政资金后,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

2. 量能负担、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税负思想

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谈到土地税时就指出:“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业太苦,不好收税。”⁽²¹⁾1942年,毛泽东批判了竭泽而渔的错误观点。他说:“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不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²²⁾这些论述,实际上体现出了“量能负担”和“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税负思想。

3. 税负要适当

毛泽东一贯强调,只有适当的税收负担,才能为人民所接受,才能调动起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才有利于经济建设。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谈到土地税时说:“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²³⁾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极端困难时期,但是,毛泽东仍然强调:“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借以休养民力”⁽²⁴⁾。1945年底,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谈到财政负担时指出:“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一九四六年中,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²⁵⁾1948年,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明确指出:“对于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²⁶⁾

4. 税收是调整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及解决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毛泽东历来注重运用税收政策去调整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并把税收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1949年,毛泽东把税收政策运用来“节制资本”。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²⁷⁾。1950年,毛泽东谈到运用税收政策去调整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在《不要四面出击》中说:“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²⁸⁾。1953年,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方案,说它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离开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说:“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限制与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²⁹⁾。“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³⁰⁾。“新税制的

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党的总路线的问题”⁽³¹⁾。

5. 必须照章纳税

毛泽东认为，既然确定了税收政策，制定了税收法规，那么，一切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又法定的纳税义务人者，都必须照章纳税。即使是军队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不例外。1949年底，他在《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均须照章纳税，并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得违犯”⁽³²⁾。

6. 必须开展反对偷税漏税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社会上总有一些不法分子总想通过偷税漏税去发财，因此，必须开展反对偷税漏税的斗争。1951年底，他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中明确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³³⁾同时，他还讲到了在斗争中要十分注意政策，坚持区别情况、区别处理的原则。如他在谈到区别对待不雇工人店员的独立工商户时说：“他们中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有小额偷漏税，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税漏税较大的”⁽³⁴⁾。应“将完全守法户和有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较少的和偷漏税稍多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³⁵⁾。

三、适当发行债券是解决财政问题和建设资金不足的一条重要渠道

毛泽东认为，既然不能靠发行货币去解决财政问题和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那么，适当地发行债券，则是一条可行的重要的渠道。1933年，为了解决红军作战经费不足和发展生产的需要，苏区政府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毛泽东说，这三百万元的用途：“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³⁶⁾。同时，毛泽东对发行公债肯定道：“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³⁷⁾。

四、财政管理思想

毛泽东在财政收支管理、财务会计管理和经济核算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方针、原则和思想、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1. 统一管理、统一领导和收支平衡的原则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肯定了“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³⁸⁾。同时，他又指出，为了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³⁹⁾

2. 节省开支的财政支出原则

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⁴⁰⁾。他还警告一切政府工作人员：“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⁴¹⁾。他要求：“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

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⁴²⁾

3. 加强经济核算，节约生产费用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⁴³⁾“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⁴⁴⁾他要求企业的“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⁴⁵⁾因此，企业“没有经济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学会经济核算。”⁽⁴⁶⁾而且，“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⁴⁷⁾

4. 实行精兵简政，节约行政经费，克服官僚主义的思想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以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1942年，毛泽东把精兵简政肯定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⁴⁸⁾。同年底，他又说：“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⁴⁹⁾建国以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到精兵简政问题。如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⁵⁰⁾。

五、合理调整利益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获得利益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强大动力与目的。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历来重视利益关系的合理调整。在这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不少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观点和原则。

1. 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原则（即“三兼顾”原则）

1942年底，毛泽东在谈到如何正确处理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时说：“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⁵¹⁾1945年底，他在谈到如何正确处理公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时说：必须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并说，这仍然是我们解决财经问题的一个适当的方针⁽⁵²⁾。1947年初，毛泽东在谈到发展生产的问题时说了三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因此，必须反对只顾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错误观点。”⁽⁵³⁾这就是说，必须兼顾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兼顾公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到1956年，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三兼顾”的思想和原则。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⁵⁴⁾。1957年，毛泽东从分配的角度再一次说明了三兼顾原则，并要求适时调节好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⁵⁵⁾由此，形成了系统的三兼顾思想。

2. 合理安排积累与消费的原则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积累是必要

的，绝不能分光吃光。他说：“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⁵⁶⁾这里，虽然说的是粮食积累问题，但实际已蕴含着积累是必要的这一规律性的认识。二是积累要适当，要注意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他说：“国家要积累，合作社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⁵⁷⁾三是积累是波浪式的。他说：“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⁵⁸⁾。四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1957年10月，他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⁵⁹⁾五是要建立必要的贮备。1945年初，他在谈到用极大的精力去帮助农村人民开展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时，指出：“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⁶⁰⁾

3.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

能否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关系到中国这个大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1956年，毛泽东鉴于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和中国地大、人多、情况复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⁶¹⁾。“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⁶²⁾。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精神，也适用于处理地方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⁶³⁾

注：

(1)、(7)、(36)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版)第一卷第119页、122页。

(2)(14)(37)(40)(41)(42)(44)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版)第一卷第134页。

(3)(4)(8)(9)(10)(11)(13)(16)(17)(18)(22)(24)(49)(51)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版)第三卷第891页、893页、894页、895页。

(5)(25)(52)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版)第四卷第1176页。

(6)(12)(53)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版)第四卷1216页。

(15)(21)(23)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版)第一卷第71页。

(19)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182页的论述。

(20)(55)(5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1997年4月版)第五卷第300页。

(26)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版)第四卷第1269页。

(2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版)第四卷第1431页。

(28)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22页。

(下转第32页)

凡高油价。这个结果与竞争市场一致。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是水平边际成本曲线，如图4所示。税负转嫁的程度取决于需求曲线的形状。图4—A揭示线性需求曲线时，价格上升仅是税额的一半，亦即转嫁50%的税负。图4—B揭示固定弹性需求曲线，由于价格是边际收入的固定倍数，故边际收入或边际成本上升时，价格上升幅度更大，因而此时，税收转嫁程度将超过100%的课税额。

三、结语

通过对局部均衡市场中的税收转嫁机制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决定税收转嫁的主要因素是：(a) 该项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的特定性质；(b) 所处市场的性质或类型，即是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或垄断市场等。

2. 税负转嫁不受法定纳税主体变化的影响，即对某商品的供给者课征或对其需求者课征不影响税收转嫁。

3. 如果对垄断商征税，则税负可以超过100%转嫁给消费者，即消费者最终支付的价格上涨额将可能超过课税额。

综上所述，尽管上述结论是在局部均衡市场的假设下得出的，但是其税收转嫁机制的实质仍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极为广泛的适用性，正确运用税收转嫁机制对我国目前的税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中慎重采用税收杠杆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接第27页)

(29)(30)(31)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92页—93页、90页、91页。

(32)毛泽东：《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87年11月版)第一册第185页。

(33)(34)(35)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54页、55页、56页。

(38)(39)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16—17页、18—19页。

(43)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249页。

(45)(50)(54)(61)(62)(6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274页、280页、272页、275页、277页。

(46)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213页。

(47)(58)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361页。

(48)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版)第三卷第882页。

(56)(59)毛泽东：《散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469页、470页。

(60)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版)第三卷第1017页。